

CSSCI来源集刊

许纪霖 刘 擎 主编

知识分子论丛

第15辑



?

西方“政治正确” 的反思

T h e R e f l e c t i o n o f W e s t e r n
P o l i t i c a l C o r r e c t n e s s

江苏人民出版社

CSSCI来源集刊

许纪霖 刘 擎 主编

知识分子论丛

第15辑

西方“政治正确” 的反思

T h e R e f l e c t i o n o f W e s t e r n
P o l i t i c a l C o r r e c t n e s s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 / 许纪霖, 刘擎主编.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14-21916-9

I. ①西… II. ①许…②刘… III. ①多元文化—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3429 号

书 名 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

主 编 许纪霖 刘 擎

责任编辑 王 旭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1916-9

定 价 6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CSSCI 来源集刊

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 主办

知识分子论丛编委会

主 编 许纪霖 刘 擎

学术委员会 (以拼音字母为序)

- 蔡英文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何包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黄克武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李 强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刘 擎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齐慕实(Timothy Cheek)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
钱永祥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萧高彦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
应 奇 浙江大学哲学系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目 录

主题 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与多元主义的危机

- 003 Mark Lilla(马克·里拉) | 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
- 009 刘 擎 | 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
- 026 施 展 | 政治正确与战后世界格局的变迁
- 035 崇 明 | 消极自由、多元主义与政治正确
- 049 孙国东 | 捍卫文化认同的正当性界限
- 071 许纪霖 | 政治正确、文化宽容与身份政治的限度何在

特稿 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

- 085 罗志田 | 作为文化、政治和学术的“南北”
- 094 David Faure(科大卫) | 从商业制度史看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
- 097 姚大力 | 元人意识中的南部中国文化优势
- 105 施 展 | 中国的多元复合结构
- 111 许纪霖 | 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视野中的南北文化
- 123 刘志伟 | 广州三重奏：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

143 李 磊 | 秦汉六朝时代的南方政权与南北关系

158 王爱松 | 京派海派论争与南北文化差异

现场 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175 许纪霖 | 世代、阶级和惯习：知识分子研究的新路径

192 夏中义 |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三种生命样式：以陈寅恪、冯友兰、
钱锺书为 人物表

笔谈 托克维尔思想的现代价值

211 邱立波 | 生而自由与创造自由

220 任军锋 | 中国的“托克维尔时刻”？

229 周林刚 | 托克维尔的综合

238 刘拥华 | “退出”与美国的“特殊性”

255 崇 明 | 在中国的现代性中检视托克维尔的理论

论文 中外思想研究

267 Lucien Jaume(吕西安·若姆) | 法国大革命中的宗教性：

另一种正当性——关于 1789 年以来的“革命重生”的思考

293 王 前 | 何谓从周边看中国：以宫崎市定和白永瑞为例

323 李永晶 | 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20 世纪中国“文明论”的视角

351 马华灵 | 古代自由主义的复兴：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

主 题

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与多元主义的危机

一个世纪以来，多元主义日益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根据多元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应该宽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各种不同的价值与各种不同的文化。然而近年来，多元主义在现实中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欧洲的恐怖主义与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穆斯林禁令”，为多元主义与宽容敲响了警钟。多元主义的宽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在宽容穆斯林的同时排除恐怖分子？反多元主义的不宽容所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禁止恐怖分子的同时容纳穆斯林？基于此，在多元主义与反多元主义之间，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西方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正确”是否正确？如何正确？本辑的主题讨论的是这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

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

Mark Lilla(马克·里拉) 著

邵依琳 译

马华灵 校

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多元的国家,这是老生常谈了。这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美妙之事。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来自那些难以接纳不同族群和信仰的国家的访客,讶异于我们的成功。自然,这并不完美,但美国确实比当今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都要好得多。美国的故事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成功故事。

然而,这种多元性(diversity)究竟该如何塑造政治呢?对将近一代人来说,标准的自由派答案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差异,并“赞美”我们的差异。对于道德教育来说,这是一条极好的准则。但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把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却是灾难性的。近几年,美国自由主义滑向了一种对种族身份、性别(gender)身份和性(sexual)身份的道德恐慌,这使得自由主义的信条被扭曲,并且使之无法成为一股可以支配的统一力量。

最近的大选及其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产生了许多教训,其中一个教训是我们必须终结身份自由主义的时代(the age of identity liberalism)。当希拉里·克林顿谈论国际事务中的美国利益及其与我们所理解的民主的关系时,她处于最佳状态,并且最振奋人心。但在国内事务上,她却在

竞选活动中丧失了那种大视野，并滑向了浮夸的多元言辞。在每个竞选站，她都明确向非洲裔、拉美裔、LGBT 和女性选民高声疾呼。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如果你要提美国的群体，就最好提及所有。否则，被遗漏的群体会有所察觉，产生被排斥感。数据显示，白人工薪阶层和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正是这样的群体。整整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和百分之八十的白人福音派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身份认同的道德力量当然有许多正面影响。平权法案重塑并改善了共同的生活。“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给每个有良知的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好莱坞努力使同性恋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正常化，而这有助于同性恋在美国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正常化。

但我们的学校和媒体对多元的执念培养出了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他们对除自己归属的群体外的状况一无所知，对接触各行各业的美国人的任务也不甚关心。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有个人认同之前，就被鼓励去谈论他们的个人认同。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多元性话语已经穷尽了政治话语，以至于他们竟然对阶级、战争、经济和共同善这些持久的问题感到无话可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高中历史课程时代错置地把当今的认同政治投射回过去，从而曲解了曾经塑造美国的主要力量和个人。（比如，女权运动的成就是真实和重要的，但如果你不首先理解国父们建立这个基于权利保障的政府体系的成就，你就无法理解女权运动的成就。）

当年轻人进入大学时，他们被学生社团、老师和全职处理“多元议题”并拔高其重要性的行政人员鼓励继续关注自身。福克斯新闻和其他保守派媒体极力嘲讽围绕着这些议题所产生的“校园疯狂”，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嘲讽是正确的。而这只能让民粹主义煽动者无意中占了便宜，他们想要从从未踏足校园者的视角出发来使学习丧失正当性。当面向普通选民发表演说的时候，如何向他们解释赋予大学生选择指定性别代

词来使用的权利的所谓道德紧迫性？如何又能不和这些选民一起，嘲笑写下“国王陛下”的密歇根大学恶作剧者之事？^①

这种多元校园的意识在这些年来已经逐渐渗入了自由派媒体，这是可以觉察的。美国报纸和广播所倡导的针对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是一个非凡的社会成就，它甚至已经改变，并且确实改变了右翼媒体的面貌，记者梅根·凯利(Megyn Kelly)和劳拉·英格勒姆(Laura Ingraham)的成名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似乎也鼓励了这种假想(尤其是在更年轻的记者和编辑中间)，即只要把精力集中于身份问题上，他们就已经完成他们的工作了。

最近我在法国学术休假期间做了一个小实验：在整整一年中，我只读欧洲出版物，不读美国出版物。我的想法是，尝试从欧洲读者的视角来看世界。但更有意义的是，我回到美国后才意识到近年来身份的透镜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新闻报道。例如，美国新闻里“第一个做某事的什么人”之类的最马虎的报道不知讲了多少遍。这种对身份剧情的痴迷甚至影响了对国外的报道，而十分苦恼的是，这类报道原本就匮乏。比如说，无论阅读埃及变性人命运的故事有多有趣，它对教育美国人理解决定埃及未来且间接决定我们自身的政治和宗教浪潮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主要的欧洲媒体会考虑采用这样的视角。

但是，正如我们不久前所见的那样，在选举政治的层面上，身份自由主义遭遇了最惊人的失败。健康期间的国家政治关注共性，而非差异。而且，国家政治的主导问题是，谁能够把关于我们共同命运的美国想象描绘得最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罗纳德·里根的构想，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巧妙。比尔·克林顿也是如此，他借鉴了里根。他把民主党带离了

① 译注：2016年，密歇根大学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学生自行选择人称代词，以促进多元而包容的校园文化。对此，该校大学生格兰特·施特罗布尔(Grant Strobl)在Twitter上写道：“我的新身份是国王陛下格兰特·施特罗布尔，你的呢？”(“My new identity is His Majesty Grant Strobl, what's yours?”)以示抗议。

身份意识那一边,并且集中精力于能够造福每个人的国内项目(如全国性的健康保险),还界定了1989年之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因此,克林顿才能够在两个任期中为民主党阵营中的不同群体作出重大贡献。相反地,身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动之以情,而非晓之以理。这就是为什么身份政治不能赢得大选,却会输掉大选的原因。

媒体对愤怒的白人男性产生的近乎人类学的新兴趣,既揭露了我们自由主义的处境,又展现了这个被多次诽谤且此前被忽略了的人物。自由派对最近总统大选的一种省力解释是,特朗普先生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把经济劣势转化为种族仇视——白人对抗的议题(the “whitelash” thesis)。^① 这是一种省力的解释,因为它允许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并且让自由派忽略了那些选民所说的首要关切。这种解释同时助长了一种幻想:从长远看,共和党右翼注定会在人口上消亡,这意味着自由派只需静候这个国家落入自己手中。但是,比例高得惊人的拉美裔在大选中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这应当提醒我们,族群在美国越是持久,在政治上就越是多元。

最后,白人对抗的议题之所以是一种省力的解释,是因为它赦免了自由派的以下罪责: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对多元的执念,如何使得具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乡村白人认为,他们是一个身份受到威胁抑或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反对美国多元化的现状(毕竟他们倾向于住在美国同质化的地区),而是反对无处不在的浮夸的身份政治言辞,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自由派应该铭记,美国政治中的第一次身份政治运动是至今依然存在的三K党。那些玩弄身份政治游戏的人,应该做好失败的准备。

我们需要一种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post-identity liberalism),而

^① 译注:所谓白人对抗(whitelash),指的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抗黑人在民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且它应吸取前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pre-identity liberalism)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这种自由主义将吸引作为美国人的美国人,并突出那些会影响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议题,从而扩大其基础。它将针对作为公民国家的国家而言说,而公民们应该团结起来,而且必须互帮互助。至于那些范围较窄、在象征的意义上代价高昂,并且可能会赶跑潜在盟友的议题,特别是涉及性取向和宗教的议题,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会低调、谨慎且适度地加以处理。(不妨改写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言论:美国已经厌倦于听到自由派该死的厕所问题了。)^①

信奉这种自由主义的教师们,应当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他们在民主国家中所承担的主要政治责任上来:形成认识到自己的政府体制和我们历史中的主要力量及事件的忠诚公民。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还应强调,民主不仅仅关乎权利,还需要公民承担责任,如知情和投票的责任等;后身份政治的自由派媒体,应就被忽略的那部分国土及那部分国土上的重要事务(特别是在宗教上),开展自我教育。媒体应当认真承担起教育美国人的责任,尤其要从历史的维度,介绍塑造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

数年前,我受邀参加佛罗里达的一个工会大会,在一个分会场就罗斯福1941年所发表的关于四个自由的著名演讲做发言。那个会场坐满了来自地方分会的代表——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拉丁裔。我们通过唱国歌开场,然后坐下聆听罗斯福演讲的录音。我环望人群,看见那些不同的面孔,我被他们对共同分享的东西所表现出的那种专注所打动。罗斯福呼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

① 译注:此前,希拉里深陷邮件门事件。对此,桑德斯曾公开为希拉里辩护道:美国人已经厌倦于听到希拉里该死的邮件门事件了。不要再讨论邮件门事件了,让我们讨论美国人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吧!里拉的表述即源自桑德斯的言论。里拉所谓的厕所问题,就是美国争论不休的跨性别厕所(transgender bathrooms)问题。该问题的争论焦点是,跨性别人群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性别认同自行选择上男厕还是女厕?自由派通常持赞同观点,保守派则通常持反对观点。而里拉的观点是,自由派不应该再纠结于跨性别厕所问题,而应该关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关心的核心问题。跨性别厕所问题实际上就是里拉所批判的身份自由主义问题,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里拉所谓的后身份自由主义问题。

认为这四种自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当他呼吁这四种自由的时候，他那激动人心的声音提醒了我，什么才是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根本。

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 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

刘 擎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突出体现在2016年英国围绕着“脱欧”问题的激烈争议,体现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白热化竞争。欧美国家的民众在经济全球化、移民与难民,以及族群差异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纷争甚至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许多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为此深感忧虑,媒体政论中“危机”与“崩溃”的字眼屡见不鲜。

在西方主流的政治理论中,许多学者都承认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存在着各种局限,但大多相信其突出的优势之一,在于应对现代性条件下的多元主义事实,在于能够以统一的政治原则框架有效地包容并安置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差异。如果当前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难以缓和甚至不断恶化,有可能突破现存政体能够吸收和容纳的有效范围,那么言称“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不再是危言耸听的修辞。就此而言,政治极化是西方政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是一个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实践相关性。本文试图针对当前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新特点,着眼于考察围绕“身份政治”问题的相关争议,探讨文化多样性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提出一些初步的评论和思考。

一、原生论民族主义的兴起

我曾在一篇年度书评文章中指出,造成当前西方社会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源自两种“结构性裂变”。其一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每个国家内部都产生了全球化的受益者与挫败者,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得失形成了对全球化的支持与反对的态度分裂。其二是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这种文化冲击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但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有效地回应这一冲击,在民众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认同问题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构成了政治态度分裂的基本背景。^① 这些政治态度上的分歧由来已久,但只是政治对抗的潜流,只有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与集结,才能显现为现实政治中相互博弈的力量,而从政治态度到政治力量的“现实化”(actualization)过程,又反过来加剧了政治态度的分裂与极化,从而导致在选举竞争和立法议程中派别分明的政治对抗现实。这正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以及特朗普最终胜选的剧情逻辑。

无论有多少人对特朗普的可疑人品与粗俗风格多么厌恶鄙夷,我们很难否认他具有超凡的政治煽动力或者(以更为中性的语词来说)政治动员力。特朗普的反建制姿态、民粹主义立场以及几乎难以掩饰的“白人优越论”倾向,在其竞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动员功能,许多评论家已经对此做过详细深入的阐述。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关切的焦点问题在于:特朗普何以能够诉诸“白种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情

^① 参见:刘擎《2016 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学海》2017 年第 2 期。

绪,突破左派与自由派长期掌控“文化领导权”,动员和集结足够多的选民形成自己的“文化政治”力量,在选战中赢得胜利?正如一些评论家分析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实际的潜台词是“让美国再白起来”(Make America White Again)。^①他鼓吹的“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是要夺回早已经被自由派的文化领导权所埋葬的“白种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种(在许多人看来)“反动腐朽”的政治意识何以能够死灰复燃?这是似乎令人惊奇的。

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术语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的,这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早在1922年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就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建基于一种信条(a creed)的国家(民族),这个信条在《独立宣言》中以具有教条式的甚至是神学的清晰性得到陈述。”^②后来,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Seymour Lipset)在论述“美国例外论”的名著中也指出,美国是“第一个新的民族”,依赖于独特的美国意识形态,其理念是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共和主义和放任自由经济。^③甚至亨廷顿——这位后来强调美国白人清教传统的政治学家——在早年也主张美国的信条论特征,认为“将民族性等同(认同)于政治信条或价值观,这使得美国几乎是独一无

① 参见:Charles M. Blow, “Trump: Making America White Aga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16, Page A23; Lola Adesioye, “‘Make America White Again’: how US racial politics led to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New Statesman*, November 21, 2016; Toni Morrison, “Making America White Again,” *New Yorker*, November 21, 2016 Issue.

② G. K. Chesterton, *What I Saw in America* (1922)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10), p. 7.

③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96), pp. 1, 17-19.